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外债是政府通过借款、发行债券等形式或由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的对外国政府、银行、企业等举借的债务。它属于财政的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信用为主体的特殊财政分配方式。同时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形式，它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它一方面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战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商业战争、殖民制度提供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强有力的手段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之一。

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举债成为很多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如荷兰通过吸收西班牙、葡萄牙的剩余资本而努力赶超这两个老牌殖民主义强国，成为 17 世纪的“海上马车夫”；18 世纪初，荷兰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强大后的英国又开始对外广泛贷款，以此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19 世纪和 20 世纪英国的贷款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外债犹如强心剂，帮助英国建立起了横跨世界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仍

被称为“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①，但20世纪美国借助外债不但摆脱了英国的控制，而且一跃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俄罗斯、日本也通过引入法国、英国、比利时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挤进世界强国的行列；二战后，许多新独立国家把举债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环节，并取得相当成绩。以上事实无不说明，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债是后进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条件和途径。

在近现代国际交往中，国家之间的借贷本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随着全球分裂为宗主国和殖民地及附属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疯狂扩张，外债作为资本输出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带动商品输出的同时，又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借债不但没有起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和受控于债权国的困境。19世纪上半叶，希腊和西班牙由于借债利率高、折扣大，陷于英国的控制中，英国贷款使得希腊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瘫痪。19世纪末，希腊被迫默许由几个大国创办的国际金融委员会监督其财政金融活动。同样，埃及政府从1863年开始借款，到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违约偿款时，一直未能摆脱外债的包围，最终使得本国财政陷入国际共管的地步。这些国家陷入债务恶性循环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该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衰微。可见，外债反映的不仅是一种借贷关系或信用行为，更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借钱或借贷关系，它与一国的政治休戚相关。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大国政治的手段，而一国政治是决定外债是否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基本条件。

中国外债史属于世界近现代外债的一部分，是中国被卷入国际经济漩涡及沦为半殖民地后产生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

^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56页。

国大门之后，在拥有广泛特权的情况下对中国实施的一种政治侵略和经济榨取的手段。但它既没有使中国如英美等国那样依靠外债实现经济起飞，也没有使中国如埃及、希腊等国一样因过分依赖外债导致国际共管的地步，中国历史上的外债犹如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一样，一方面客观上推进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密切攸关。

二、外债历史研究与资料

中国外债史的研究是一个前人学术研究积累较为丰富的领域。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外债史研究

20 世纪初，中国外债史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时值国家财政危机之际，国内部分学者和有关部门立足现实，开始研究外债史。1904 年广智书局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对中国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1914 年吴廷燮《清财政考略》（铅印本），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外债亦有涉及。20 世纪 20 年代后，专门研究外债的著作和文章逐步增多，中国银行《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外人在华投资》^①、万籁鸣《整理中国外债问题》^②，贾士毅《国债与金融》^③、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④。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 年版。

上海光华书局，1927 年版。

商务印书馆，1930 年版。

④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3 卷第 2 期，1935 年版；第 3 卷第 1 期，1935 年版。

陈其田《甲午前中国外债考》^①、赵在田《我国外债研究》^②、孟宪章《清代外债史略》^③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④等；人物方面的研究有《左宗棠与外债》^⑤，铁路方面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⑥，矿业方面有《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专论庚子赔款首推王树槐《庚子赔款》一书影响最大，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著。相关论文还有方励生《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⑦、唐林《庚子赔款》^⑧、蔡百受《庚子赔款偿付之经过》^⑨、杨志章《英国庚款与其用途》^⑩等。有关部门也开始对外债资料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统计。如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涉及了近代以来铁路外债和电信外债的举借、偿还；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则涉及电讯外债的举借和偿还情况；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则是对晚清及民国时期外债作了缕析。其中王景春《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交通部1912年发行）的统计资料，已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原理，其科学性明显增加。专门论述民初外债的文章有《从六国银行团到善

① 陈其田，《经济学报（燕京）》，1941年第5期。

② 赵在田，《经济丛报》，1945年第5期。

③ 孟宪章，《中央银行月报》，1947年第7期。

④ （美）雷麦（C.F. Remer）著，蒋学楷、赵康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⑤ 《天津益世报史学》，1936年3月17日。

⑥ 陈晖，《建设研究》，1943年9月。

⑦ 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第1期。

⑧ 《银行月刊》第5卷第1号，1925年1月。

⑨ 《银行周报》第11卷第40—45期，1927年10、11月。

⑩ 《银行月刊》第6卷第6号，1926年6月。

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①等。专门论述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情况的资料有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该说明书列举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

在财政史学界，也在有关论著中，对外债问题有多少不同的介绍。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917年）、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②、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④、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⑤、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⑥十册、鞠清远《唐代财政史》^⑦、刘不同《中国财政史》^⑧等。他们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食货”的观念来剖析财政的收支活动。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和有关机构的研究亦值得在认真鉴定的基础上加以重视。如日本学者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⑨是最早的著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第三章，日清战争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入及关税收入额。该书详细论述了晚清几笔大的外债，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大山嘉藏《中国的国债与列

邹思齐，《东亚经济》，1942年9—12期；张忠绥，《军事与政治》，1943年8期；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8期。

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③ 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

⑤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⑥ 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

⑦ 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⑧ 大东书局，1948年版。

⑨ 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

强》^①、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②、木村增太郎《中国的经济与财政》^③、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④、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⑤、滨田峰太郎《中国的财政和公债》^⑥、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⑦等都对近代的内外债作了细致探讨；外国在华银行及有关机构也对中国外债问题进行了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有的还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如贝林《中国的外债》^⑧、孔士《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⑨、菲尔德《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⑩、亨利·巴尔《中国外债研究》、田村幸策《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⑪等。这些国外学者和机构的研究成果，虽带有主观的偏见色彩，但对外债资料的补充整理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首推以贾士毅、雷麦和汤象龙的研究最具特点，郑伯彬和罗玉东则拓展了外债研究的新思路。贾士毅利用政府财经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主要论述民国时期的内外债状况，在第三编“外债”部分中对晚清时期的外债面貌做了概略性的勾勒，并把民国以前外债分为所借已偿和所借现负两大部分，但叙述和统计较多，缺乏深

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

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

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

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

⑤ 《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

⑥ 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

⑦ 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

⑧ Baylin, J.R. 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 1925 年天津出版。

⑨ Coons, A.G.: The Foreign Public Debts of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0.

⑩ Field, Frederick V.: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 Consortiums, Chicago, 1931.

⑪ 《东亚》，1931年9月号。

刻的分析。雷麦《外人在华投资》是受纽约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广泛搜集资料，亲自在英美等国考察核校，因此，一般来说，关于外人在华投资问题，这是一本比较详尽的资料性著作。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他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极力地掩饰外人在华投资的侵略实质，尽管书中提及近代中国的“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①。汤象龙的著作则是具体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并随附了大量的统计数据 and 表格，是微观研究的力作，他认为：“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二以上，各时期的财政的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时代愈近，关系愈不可分离。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情形，军费、外债和赔款三宗岁出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政府军费随之膨胀，军费膨胀，外债即随之。及对外战争结束，赔款又随之。或因赔款摊偿，外债又随之。此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②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该文的最大特点是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和相关文献列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至今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郑伯彬《清末财政与财政制度的改革》^③和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案》^④是从外债与财政相互影响的角度展开探讨的，是从横向的角度来研究外债史的初步尝试。

这一时期的研究受国内战乱环境的影响，较多地以陈述外资侵华的历史事实，唤起国人抵制外资侵略为主。具体表现为债项、数

① （美）雷麦（C.F. Remer）著，蒋学楷、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6页。

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

③ 《中央银行月报》，新第1卷第10期（1946年10月）。

④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5月）。

量的讨论为多，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政论性的特点。虽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和学术局限性，但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功能的取向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一时期的著作基本是以叙述历史概况为主，缺少理论分析；也有一些论著存在因现实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而突出了现实性却忽略了科学性的现象。有的虽然在内容上涉及了中国外债史的范畴，但是作为总结人们经济活动经验教训和经济发展历史规范的外债史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二）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外债史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术研究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起来，建立了新的研究队伍，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契机，中国外债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出现了专门论述中国外债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揭露外债的经济侵略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二是较多研究铁路外债。同时，部分学者继续从横向角度研究外债与财政、外债与战争等的关系。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 1954 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在 1966 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其中丛刊的第六种——徐义生编写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是较早问世的专论外债的著作。该书使用统计方法，既有各时期按年编列的外债表，也有若干专题性统计表，资料详征博引，充分利用了《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奏稿及各国档案，便于查核。但该书属资料性质，且 1927 年以后的部分未编列，因此没有充分阐述中国外债研

究的全局性问题。同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刘秉麟著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目前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时期外债的专著，该书内有“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三编。但该书的论述过于简略，对近代外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主要特点、研究方法等，都没有正面论及，基本上还是资料的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①

为适应当时反帝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多注重外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投资的反动性，认为外债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一大批论著和资料汇编都是以此为基调的。诸如钦立本《美帝经济侵华史》、魏子初《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等等^②。除了资料汇编和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外债侵略性的研究论文，如《美国对华投资的历史发展及侵略性（1784—1914）》、《19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论鸦片战争借款》、《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美帝与庚子赔

^① 吴景平：《关于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 1914 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① 等等。

这一时期对铁路借款论述颇多。铁路是交通运输业中的重要部门，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晚清政府限于国力、财力等原因，走上了借债筑路的道路，使铁路外债一度占到晚清政府外债总额的 73%，在“开利源”、“塞漏卮”的同时，清政府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以吕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为代表，史学界出现了铁路外债研究的热潮，发表了一大批有关铁路借款的文章。如《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铁路权利的阴谋活动（1898—1899）》、《从铁路史实中揭露美帝侵华的狰狞面目》、《粤汉铁路借款包工的大骗局》、《美帝掠夺川汉铁路的罪行》、《英帝国主义是怎样掠夺河南铁路权利的》、《辛亥革命前美国掠夺粤汉铁路的阴谋》、《美帝国主义与芦汉铁路投资竞争》、《美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美帝国主义与粤汉铁路借款》、《粤汉川汉铁路借款问题上 0 下》、《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帝攫取芦汉、津镇与粤汉铁路的阴谋》、《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

^① 《历史教学》，1951 年第 5 期；汪敬虞，《经济研究》，1965 年第 12 期；彭泽益，《经济研究》1962 年 12 月；孙毓棠，《历史研究》，1951 年 1 卷第 5 期；贾淮诚，《历史教学》，1951 年 2 卷第 4 期；荣孟源，《大公报》，1951 年 10 月 2 日；孙毓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孙毓棠，1955 年；蓝天照，《学术月刊》1957 年第 7 期；蓝天照，《学术月刊》1958 年第 3 期；黄铁，《史学集刊》，1957 年第 1 期；杨格，《羊城晚报》，1960 年 6 月 20 日；刘克祥，《历史教学》，1962 年 6 月；魏永理，《学术月刊》，1962 年第 11 期；洪霞管，《学术月刊》，1964 年第 4 期；川虹，《新民晚报》，1964 年 7 月 10 日；顾岳中，《文汇报》，1964 年 6 月 6 日；朱元，《历史研究》，1966 年 3 月。

义在东北三省的铁路争夺》、《1907—1908 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湖南矿务总局借债创办史》、《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等等。同时，研究领域继续拓宽，不再就外债论外债，更多关注外债与财政、外债与战争的关系。发表的文章有《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等。

此时，台湾地区的学者和苏联、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外债问题，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基本一致。台湾有王树槐《中国近代的外债》^①、李国祁《1895 年列强对中国偿付战债借款的竞争》、黄俊彦《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1895—1900）》^②、陈仲秀《英国银行界从中英借款中所获的利润》^③。苏联有鲍尔迪列夫《贷款——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工具》、叶鲁萨里姆斯基《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德国垄断组织在中国的渗透》^④。日本有小山弘健和浅田光辉合著《日本帝国主义史》^⑤。其中，王树槐认为：“外债本身，利害兼备，用之得当，利多害少，用之不得当，则害多于利。就清末民初的外债而言，实利少害多。……就祸害方而言之，可分为二：一为财经的损耗，一为利权的丧失。”黄俊彦认为：“就外债本身而言，它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小山弘健指出，外人在华投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式的殖民扩张”。

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对外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过程。早期古典学派从反对国债的立场出发，对外债持否

^① 《思与言》第 5 卷第 3 期（1967 年）。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1 月版。

^③ 《清华学报》（台北）第 5 卷第 1 期（1965 年）。

莫斯科 1962 年版；《历史问题》，1960 年第 9 期。

^⑤ （日）小山弘健、浅田光辉合著：《日本帝国主义史》（二），青木书店，1960 年，第 193—195 页。

定态度，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谟说：“国家如不消灭公债，公债必然消灭国家”。但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二战后一度盛行的发展经济学家视外债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于五六十年代主张运用外债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起飞”和弥补国内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首先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全面否定外国资本曾压迫过旧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认为：“毫无疑问，外国资本在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尽管可以指责说中国经济（至少它的现代化部门）被外国人控制得太多了，并且它的命运掌握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列强手中，但事实却是，1937年之前中国所发生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经济现代化，其进展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促成的，最新式工业的开始出现也是由外国资本促成的，没有外国资本的新式工业是不存在的。”^①当然，侯继明的观点应受到批判，因为他抹杀了外国资本对近代中国的外债的经济侵略性和政治奴役性。

总起来讲，这一时期国内的中国外债研究由资料的整理和陈述逐步转向系统研究。较多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则着重于铁路外债，相对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积极作用，与欧美学者几乎形成两个极端，中外学者都缺乏客观的、理性的研究。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外债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本领域的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受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政策的影响，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

^① （美）侯继明：《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1840—1937），沈祖炜译，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史研究的一些“定论”之见有了重新的思考。中国外债研究进入了一个日益欣欣向荣的阶段。

首先，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史学界对马克思及欧美学者提出的外债理论有了充分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外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海外贸易、殖民战争是外债产生的温床；外债具有生息资本的独特性质，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信用的两重性导致外债的两重性本质，外债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因其虚拟性而影响经济发展。列宁也指出：“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入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把外债视为经济发展“引擎”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也从现实的发展中不得不承认外债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依附于债权国而落入债务陷阱。1988年许毅发表了《“两声炮响”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提出了外债的两重性问题。对外债两重性的客观认识，使史学界对外债性质的讨论上，从片面强调“恶”债发展为全面客观认识近代外债的“双面刃”特征，挖掘了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合理因素，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和文章。如丁日初认为，外资“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和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和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因此从历史的宏观和外资的整体来考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9页。

察，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促进的一面终究占主要地位”。^① 许毅认为，“外债的这种‘恶’的性质，在晚清以至于整个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成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同时，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又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② 许涤新、吴承明都指出，外资不仅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主要成分^③；姜铎认为，外国在华投资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侵略，不过，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与管理经验^④；郑友揆、张仲礼指出，外资对旧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亦有弊，得失兼备^⑤。

其次，资料整理上有重要突破，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如《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⑥ 按内容分类，分编为三册：第一册主要包括对中国外债作过专门研究的外国人所著的专论、简史，第二册主要是西方有关国家所组成的银团或财团研究中国外债对策所形成的文

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许毅：《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前言部分。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总序，第 17 页。

姜铎：《如何看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文汇报》1982 年 7 月 5 日。

郑友揆、张仲礼：《历史上外国在华投资的几种方式和经验教训》，载《利用外国资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9—152 页。

⑥ 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内部发行），1988 年版。

件，第三册是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部分债项的原始文件和资料。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随后编辑的《民国外债档案史料》^① 12 卷，主要为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债项史料，包括有各债项的照会、说帖、合同、呈文、议案、训令、章程、规则、函件、电文等等，它们中的很大部分是首次披露的原始档案资料，对中国外债史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另有《清代外债史料》^②、《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④，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 20 世纪 60 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 1853—1927》后又一丰硕成果。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单独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⑤，其中第五辑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资料，内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全面内战等不同时期的内外债资料。以上这些资料论著的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⑥ 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孙毓棠的论文集《抗戈集》^⑦ 中收录的文章绝大部分内容论述近代外债与经济的关系，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⑧ 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和论文。许毅《清代外债史

①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 1990—1992 年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印 1988 年版。

③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内部发行），1990 年 12 月版。

④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年版。

⑤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⑦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⑧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论》^①代表了清代外债专题研究方面的前沿水平，详细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此前学者涉及较少。隆武华的《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②则堪称外债两重性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作者从外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对外债概念进行了系统性辨析，拓宽了外债研究的视野；将外债分为狭义外债和广义外债，探讨了外债性质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从历史出发，辩证地分析了外债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分析了外债与政治、军事、财政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曹均伟以外资为讨论要点，撰写了《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③、《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④、《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⑤；杜恂诚以日本在华投资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⑥；汪敬虞以外国在华银行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⑦；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⑧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讨论外债与海关之间的问题；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⑨也涉及了外债的收支问题；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

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

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年版。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版。

④ 立信出版社 1996年版。

⑤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

⑦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⑧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

迁》^①较为全面的论述了晚清外债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主权的影响》^②比较富有特色，文章不仅叙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除此之外，大量的财政史、经济史等论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叙及外债，如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③、周伯棣《中国财政史》^④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⑤、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⑥、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⑦等，都涉及中国近代外债问题。其中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⑧把外债专列一章，着重讨论了国际收支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资金供给问题，提出围绕中国外债的“恶性循环”论点，属于开创性的研究；书中除对重要外债的原委和后果详加分析外，对中国政府为开发经济而举借的“实业借款”作了专门的研究和评价，按用途计这种借款占本时期外债最大比重（36%），而过去经济史著作较少注意这点。至于有关论文则不胜枚举。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战争外债的文章有36篇，研究铁路外债的文章有41篇，研究外债与晚清经济的文章有48篇，研究外债与晚清财政的文章达60篇，总论晚清外债（含外资）的论文也有35篇之多。

第三，研究领域不断深入，研究角度不断拓展。随着经济史、财政史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外债史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深入的取向。例如从横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

②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⑦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